

晚清驻外使节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中的作用

田鑫¹, 刘合成²

(1.天津师范大学 体育中心, 天津 300387; 2.杭州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要: 对清朝晚期驻外使节与西方近代体育传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晚清驻外使节是身处异质文明冲突的最前沿, 较早接触到了西方近代体育, 并在引进外籍兵操教员、宣传和带头实践近代体育等方面做出贡献。

关 键 词: 晚清; 驻外使节; 近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6-0041-03

Functions of ambassado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introducing modern western sports

TIAN Xin¹, LIU He-cheng²

(1.Sports Cent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ambassado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western sports. Ambassado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a special group of intellectuals, who contacted with modern western sports earlier, and made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to introducing foreign army trainers, writing books to promote modern sports, and leading the practice of modern sport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mbassador; modern sports

清政府从1875年向海外派遣驻外使节,截至1911年,清政府共向16个国家派驻了公使,在世界45个商埠设置了领事馆,驻外使节的人数日趋增多。驻外使节身处异质文明冲突的最前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1 对西方体育文化的最初了解和传播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之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向西方派驻使节。出于办洋务的需要,要求使臣“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1]这样,使臣们大多利用其独特的身份和便利条件,积极并全方位地考察西方社会,并通过奏章、书信、日记等形式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千姿百态的“西洋图”,其中也包括对赛艇、

赛马、斗牛、溜冰等西方体育活动的认识和了解。

对西方体育考察记录比较详细的是黎庶昌。黎庶昌曾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德、西班牙等国,任参赞,并游奥、比、瑞、葡等国,驻西方六载,撮所闻见,著《西洋杂志》,后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在《西洋杂志》中,黎庶昌饶有兴致地记录了赛艇、赛马、斗牛、溜冰等活动。并指出“赛马为英人所重”,斗牛“惟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有之,为国俗一大端”,溜冰则“西洋风俗大同,名为司盖丁尔令克(skating)”。由此可见,黎庶昌对这些国家的体育活动有一定的了解。

关于溜冰,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曾写道:“饭后,偕内人率女儿至德文舍阿园林,观跑冰。”寥寥十余字,仅仅提及却未详细介绍。黎庶昌^{[2][24]}的《西洋杂志》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写道:“每逢冬令,水泽腹坚,相与游行冰上,以为嬉戏”。同时他仔细观察了溜冰鞋:“其法用皮条作如中国草鞋或木屐式,底安铁骨,长与之齐,而薄其棱。掌心前后,横贯铁条各一。

铁条两端，安四小木轮，务令坚实圆滑，转圜如意，着时用带着紧”。此外他还记载了旱冰场地：“长廊巨厦，其地用石脑油和沙土筑平，人行其上，与真冰无异”。在谈到溜冰在西方广受欢迎时说“各国近郊，皆有溜冰之所”，西班牙更是“君主必躬自为之，以示倡导”。看来西班牙对溜冰格外垂青，而1924年成立的国际轮滑联合会的总部就设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黎庶昌^{[2][120]}的《西洋杂志》中还有在英国泰晤士河观看赛艇的记载：“先有两小船排列桥边，窄狭仅容坐一人，前后有锐木挺出，各长丈许，如鲟鳇鱼嘴，安设双桨……须臾两小船动桨如飞……多人聚观，以观胜负。驶至上流约十五里之某地而回……次易两人同坐之船，较胜负如前。次又易四人同坐之船，最后九人同坐，四船并出，群桨并出，浪花齐沸”。短短数语，向国人形象道出了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多人赛艇的盛况。在《西洋杂志》中还描述了西方赛马、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岁自夏至秋，按礼拜日皆有之，观者动以十万计……”；在论及斗牛时，他看到西班牙“斗牛之日，举国若狂”，但由于“先斗死马，再以人斗”，以至“斗死一人”，所以“西洋各邦，无不讥其残忍；然成为国俗，终不能革”。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育活动常令国人感到耳目一新。

另外，还有一些驻外公使留有对某些西方体育项目的记录，如张德彝^[3]，他曾先后8次以随员、参赞和公使的身份出使海外，著有8本关于西方见闻的八述奇。在三述奇中有关于羽毛球的最早记载：“有种玩物，名曰‘巴塔多尔’（badminton）者，系一长柄木圈，内织丝绸[网]。圈周与柄，长各尺半，以之击拱把鹅翎。翎长五寸，十数根束于一处，下半包以皮布。二人相距数武，彼此对击，多中者胜。”

从上述史料可以发现：驻外使节对西方体育的态度是包容和喜爱的，他们在观赏西方体育活动时兴趣盎然，在著述中对这些活动的描写绘声绘色。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西方近代体育逐步“东渐”，驻外使节也成为近代体育的早期传播者之一。他们向国人传递了西方体育的信息，为国人接受西方体育奠定了基础。在记录、传播西方体育的同时，驻外使节还注意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不重视体育而造成的积弱现象，如驻英公使薛福成^[4]认为“宋明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除著书以外，使节们还引进外籍兵操教员，更直接地推动了西方体育文化的传入。

2 为引进“洋教习”提供便利

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兴办教育以提倡

西学，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主要有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1881年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创办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创办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的南洋水师学堂、1895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等。这些学堂大都仿照外国的同类学堂设置课程，一般都设有兵式体操课，其中军事学堂中的兵式体操课程更多^{[5][54-55]}。这些洋务学堂都聘有“洋教习”，而驻外使馆的建立为引进洋教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早在1879年10月，李鸿章在《论海防》一文中指出：“若延西人教练兵船，应由总署函告出使大臣，谘访西国宿将，择其专门名家，能听调度者用之较有实济”。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蚊船如须西人教练，有无堪膺是任，仰须函致出使英法大臣延访，其中外各员共事必思斟酌善处”。同年11月清政府发出上谕，表示在访订洋教习方面国内大臣可与“出使各国大臣函商办理”。这就为驻外使节推荐、引进洋教习提供了机遇。而使节们对西方环境较为熟悉，也为他们推荐、引进洋教习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当时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因此晚清的外籍教员主要从英、德两国引进。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命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募一批军官来华，协助北洋淮练各军的操防，9月，李凤苞选募24名军官以俾斯麦使团（Bismarck Missioniers）的名义来华。这些军官“皆由该国武备院读书出身，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习之选”，他们不仅帮助加强了北洋淮练各军的训练，而且在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成立后，其中的许多人又担任了军事教习。

同样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为提高军队训练能力，先派驻德公使李凤苞与“德国海部密商”，延请了4名德国军官来华，后又致电继任公使许景澄选聘了两名德国军官。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需设3名洋教习，张之洞“电致使英大臣刘瑞芬代为募订”。1896年初，张之洞创办江宁陆军学堂，“电托出使大臣许景澄延请德国精通武事者五人为教习”，同时附设铁路学堂，延请德国洋教习3人，也请许景澄代聘。

这些军事学堂的兵操训练以德国兵操为主。德国兵操主要包括单兵教练和队列训练，也有单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1957年，一位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八旬老人回忆说：“这个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三足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此外还有游泳、滑

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5]另外，学堂也举办运动竞赛，“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举行校际运动会，作为水师训练的特有体育活动则是有趣的‘爬桅’竞赛”^[6]。

此外，驻外使节还引进了诸多国外的军事科技人员，其中不少人有体育特长，他们在华日常从事的体育活动，也间接地传播了西方近代体育。因此，晚清政府在引进洋教习的过程中，驻外使节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3 对学校设置“体操科”的积极倡导

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深，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速度也在加快，西方近代体育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和接受。在此过程中，驻外使节又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等维新派广泛介绍西方文化，力倡“西学”，从德、智、体三育的角度倡导西方近代体育。这一时期的驻外使节大都积极地响应变法，翻译西书、创办学堂、培养人才。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兴办学校。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堂设置“体操科”。

曾任出使大臣的张荫棠为西藏学校体育的开展规划了蓝图，张荫棠历任驻美参赞、总领事，驻西班牙代办等职，1906年任帮办驻藏大臣，他提出了“练兵兴学，以图抵制”的口号，并依据《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西藏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汉文传习所、藏文传习所等新式学堂的办学章程，这些学校的必修课里都包含体操课程。在第一、第二初等小学堂、汉文传习所和藏文传习所内还配有专职的体育教师，这表明张荫棠非常注重在西藏传播西方体育。他还提出“计前后藏各寺院三千余，拟令自筹经费，各立汉文蒙学堂一所，兼习算学，兵式体操”^[7]，计划聘用南北洋粤蜀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教员。但可惜的是，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4 对西方体育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甲午战前的驻外使节称为早期驻外使节，甲午战后的则被称为后期驻外使节。同早期驻外使节相比，后期使节的身体力行，积极参与西方体育活动，成为他们传播西方体育的一大亮点。如1907年任出使美、墨、秘、古4国大臣的梁敦彦少年时期在美国留学时，曾和詹天佑组织了“东方人”少年棒球队，梁诚、吴仲贤、蔡绍基等都是队员，其中在1902-1907年，梁诚任驻美、西、秘三国出使大臣，吴仲贤和蔡绍基也都从事过外交工作。他们在美国留学时，酷爱体育，曾多次带领这支棒球队进行比赛，并获得胜利，也开创了中国人棒球运动的先河。他们还积极从事溜冰、划船、网球等运动。梁敦彦归国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网球会，举办了多次网球比赛。

综上所述，在晚清西学东渐、西方近代体育传入的过程中，驻外使节的作用和功绩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 [1] 葛士浚. 清朝经世文续编[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2724.
- [2] 黎庶昌. 西洋杂志[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3]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33.
- [4] 薛福成. 出使四国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5：137.
- [5] 国家体委体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54-55.
- [6] 王恩溥. 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G]//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21.
- [7] 朱解琳. 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38.

[编辑：李寿荣]